

# 一位藏族革命家

——巴塘人平措汪杰的时代和政治生涯

梅·戈尔斯坦、道帛喜饶、威廉·司本石初 著  
黄潇潇 译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香港大学出版社

香港田湾海旁道七号

兴伟中心十四楼

www.hkupress.org

© 香港大学出版社 2011

© 2004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ased on *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üntso*

*Wangye* by Melvyn C. Goldstein, Dawei Sherap, and William R. Siebenschuh,

this Chinese edition is translated by Huang Xiaoxiao.

ISBN 978-988-8028-68-9

版权所有。本书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图片，

如未获香港大学出版社允许，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袭或翻印。

盈丰国际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 目录

插图目录	vii
序言	ix
致谢词	xiii
译者注	xiv
引言：历史背景简介	1
第一部分：在康区和中国内地成长	5
第一章：巴塘童年	7
第二章：洛桑顿珠的政变	15
第三章：学校生活	22
第二部分：「西藏共产党」时代	39
第四章：策划革命	41
第五章：回到康区	49
第六章：去拉萨	59
第七章：印度共产党	77
第八章：起义前夜	87
第九章：逃往西藏	99
第十章：从拉萨到云南	108
第三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	121
第十一章：再回巴塘	123
第十二章：《十七条协议》	133
第十三章：再赴拉萨	146
第十四章：与解放军在拉萨	155

第十五章：多事之年	163
第十六章：北京插曲	174
第十七章：开始改革	192
第四部分：监禁	199
第十八章：拉萨的紧张局势	201
第十九章：「地方民族主义者」	211
第二十章：入狱	220
第二十一章：单独囚禁	228
第二十二章：立誓沉默	240
第五部分：获释以后	251
第二十三章：出狱	253
第二十四章：新的斗争	267
第二十五章：民族政策	275
代后记：平汪的话	292
附录一：《东藏人民自治同盟简章》	299
附录二：中央党校理论增刊《平汪同志与旅外藏胞的谈话纪要》	308
附录三：八十年代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对有关民族方面的 几点意见	321
附录四：回忆扎喜旺徐同志	334
附录五：呈给中央常委领导同志的四封信	358
附录六：给国务院新闻办负责同志的信	399
索 引	403

# 插图目录

## 照片

- 图一：巴塘，摄于1940年 8
- 图二：平汪父亲噶冉阿西 9
- 图三：平汪与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的学生及西藏各地区学生  
四川联合会成员合影，1940年摄于重庆 33
- 图四：宇妥·扎西顿珠，1940年代左右摄于拉萨 64
- 图五：平汪与阿旺格桑，1944年摄于噶伦堡 79
- 图六：毕朔望、平汪、巴苏与叶华（萧三夫人），1982年摄于北京 83
- 图七：恭布泽仁（海正涛），1946年摄于德钦 92
- 图八：平汪、达瓦、听列尼玛和益西群培，1947年摄于丽江 106
- 图九：平汪与其他西藏共产党成员，1947年摄于拉萨 112
- 图十：平汪与其他前西藏共产党成员，1950年代中期摄于拉萨 113
- 图十一：平汪第一任妻子紫莉娜，摄于拉萨 116
- 图十二：平汪与巴塘地下党成员及东藏民主青年同盟成员合影，  
1949年摄于巴塘 125
- 图十三：王维舟、平汪和张国华在西南局总部，1950年摄于重庆 131
- 图十四：平汪与西藏代表团书写藏文版《十七条协议》，1951年摄于北京 144
- 图十五：西藏工委领导在罗布林卡拜访达赖喇嘛，1951年11月摄于拉萨 155
- 图十六：平汪与张经武下象棋，1952年摄于拉萨 162
- 图十七：藏军及其旗帜，1952年摄于拉萨 165
- 图十八：索康噶伦、凯墨和计晋美，1952年摄于拉萨 168
- 图十九：拉萨民众在大昭寺附近的八廓街阅读最早的藏语「报纸」，  
1952年摄于拉萨 169
- 图二十：毛主席与中央领导会见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1954年摄于北京 179

图二十一：万隆会议后周恩来与陈毅在成都停留，摄于1955年	190
图二十二：平汪、达赖喇嘛、陈毅和班禅喇嘛视察解放军部队， 1956年摄于拉萨	195
图二十三：平汪、嘉乐顿珠和茨丹央珍，1999年摄于北京	259
图二十四：流亡藏人代表团，1979年摄于北京	264
图二十五：平汪与江泽民讨论西藏问题，1998年摄于北京	288

## 地图

地图一：中国及其周边地区	xv
地图二：东藏	xvi
地图三：卫藏	vxii

# 巴塘童年

我于1922年1月出生在巴塘，一个位于康区（东藏）偏僻而美丽的村庄。这里距拉萨大约八百多公里，距北京一千九百多公里（见地图一）。巴塘坐落在海拔约两千六百公尺的山谷中，夹在西边的小河「巴河」与东边的山脉之间。这里的气候较西藏宜人，经济形式以农耕为主，尽管地形崎岖美丽，政治骚乱却不断。我后来作为藏族革命者的一生，与巴塘动荡的历史和我在这里度过的童年密不可分。

如果依照父母最初为我做的安排，我会成为僧人而非革命者。我四岁时到当地寺院与叔叔同住。他是位知识渊博的僧人，曾在拉萨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学习。在我们那里，年长的僧人收一位年轻侄子同住是很平常的事。我也很喜欢在叔叔身边。我没有正式受戒，但我记得他们给我剃了和尚头，而我也开始背诵祷文。我一生的宗教修习生活似乎就要这样开始了，叔叔却突然去世。我记不太清当时的具体情况，但他的去世使我不得不离开寺院，因为我还太小，寺院里又没有别的亲戚可以照顾我。不久以后，父母把我送进政府设在巴塘的学校。这个决定极大地改变了我的人生。

对于藏族地区来说，巴塘因拥有正式教育系统而显得特别。中国政府于1907年在这里建立一所现代学校，并规定每个藏族人必须上学。更出人意料的是，巴塘还有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及孤儿院），好多巴塘人都在那里念书。由于有这些学校，许多巴塘人学习了中文甚至英文，其中一些人后来在中国政府里担任要职。

我从七岁左右开始就读中国学校，直到十二岁。老师们都是会讲流利汉语的藏族人，课程包括汉文、藏文、数学。课程安排相对来说很简单。早上和下午我们各上两小时课，中间有午餐休息时间。我们不像现



图一：巴塘全景，摄于1940年。

在的小孩那样有课外作业，上课时也没有钟表；我们靠辨识太阳的方位来判断时间。

我喜欢学校和学习，也非常用功。父母希望我能精通藏文，于是安排我在一位已还俗的僧人那里额外补习语言课。他曾在巴塘设立第一间图书馆。因为我有一位好朋友住在教会的孤儿院里，所以我也学了好多经传教士翻译成藏语的基督教歌曲和西方故事。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平安夜」和阿里巴巴的故事时那种兴奋的感觉。

在一段时期里，看起来我将拥有一段多少算是正常快乐的童年，然而当地纷乱接连不断。我们康巴人一向对外来统治者心怀怨恨，当时在家乡不断有反抗汉族官军的事发生。我父亲是反抗汉人军阀的积极分子，而我在成长过程中也经常听关于过去的战斗和康巴英雄的故事。我

能颇为准确地指出我最初对「独立」、「自治」、「反抗」这些概念产生感觉的时候，也就是格桑泽仁于1932年来到巴塘时。那年我十岁。<sup>1</sup>

我清楚地记得格桑泽仁抵达巴塘的情景。他骑着一匹壮硕的汉地马进入村子，穿着光鲜政府制服的他浑身散发荣耀。他的正式使命是在巴塘建立国民党分部，但他也有自己的打算，包括推翻当地军阀刘文辉，以及将康区和巴塘的统治权还给藏族人。他立即获得巴塘重要藏族政治力量的支持：曲德寺和当地藏族民兵（这是一支由大约一百五十人自愿组成的民兵队，只在有战事或骚乱时组织在一起）。尽管有他们的支持，要控制巴塘仍需击败一支三、四百人的国民政府驻军。格桑决定智取，不用武力。他选了一个传统手法：设下鸿门宴，邀请汉族司令和他的军官们前来。

格桑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重要官员，驻军不得不认真对待他的邀请。当时驻军司令不在巴塘，但副手周队长带着他的高级助手们来了。一到场，格桑就命令他们缴出枪械，并告诉周队长，照做就可以安全离开，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周只得从命。但仍在驻防地的汉族士兵却拒绝交出武器，也不让藏人进入驻地。情势陷入僵局，第二天一早战斗打响了。

我家离驻防地不远，枪战开始后，我吓坏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战场中的枪声，震耳欲聋的声响让我和弟弟用棉被盖住了头。我母亲也惊

---

1 1927年至1928年间，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党政府着手征服当时控制大部分中国的「军阀」。其中之一即康区（中国人称之为西康省）统治者刘文辉。

1931年，蒋介石派一位名叫格桑泽仁的巴塘藏人来牵制刘文辉。格桑泽仁从巴塘的政府学校毕业后，曾前往云南读中学，后来进入西康军官传习所。他聪明而有雄心，1924年加入国民党，是其第一位藏族党员。到1927年时，他已经搬去当时中国首都南京，被任命为中国政府处理藏族事务的蒙藏委员会委员。二十九岁时，他以西康党务特派员的头衔被送回巴塘。他的正式任务是在西康筹建一个国民党分部，以加强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当地的影响，但对蒋介石来说，这只是削弱刘文辉势力的第一步。——戈尔斯坦、喜饶、司本石初注

恐万分，因为父亲当时在民兵队里。她立即去家里的佛堂为保护神献上供品。

战斗一直持续到上午，最后汉族驻防军终于投降了。硝烟散尽后，格桑把所有人召集到曲德寺。准备好对众人讲话之后，格桑用手枪对天发射几次引起众人注意，然后告诉我们，他现在是这里的首领，藏族人又恢复了对巴塘的控制。

庆祝胜利后不久，格桑把所有人聚集到村里的学校，教大家他自己创作的新歌曲，叫《新康藏之歌》。我现在不记得所有的歌词了，但歌曲大意是，我们藏族人要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康区人和巴塘人进入新时代了。

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昂，因为有太多值得庆祝的事。战斗中没有一个藏族士兵（或汉族士兵）身亡，一夜之间格桑就获得了六、七百支来福枪和大量弹药。身材高大、胡须黝黑的格桑成了我们年轻人心目中的英雄。（当地人这样形容他：「中央政府的令，格司令的嘴」）。但事情当然不会那么简单，我也从中学到很多。战斗并没有结束。国民党军队不打算就此善罢甘休，其他力量立即开始为打倒格桑而聚集起来。

在我们那块充满政治动荡的土地上，联盟往往不稳固，承诺也靠不住。格桑经云南到巴塘时，途经巴塘西南、与云南接壤的盐井地区（见地图二）。这是一个西藏境内的康巴自治区。在那里，他与当地颇有影响力的贡嘎喇嘛讨论了自己的计划，并寻求他的宝贵支持。当时，贡嘎喇嘛看上去是支持格桑的行动的，但当他得知格桑已经解除中国驻军的武装，并将他们赶出巴塘以后，贡嘎喇嘛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弯。为了不得罪任何人，他偷偷给刘文辉位于康定的驻军总部送去一封信，否认对格桑的任何支持。

那以后迅速发生了一连串事情。由于一系列巧合，格桑的手下抓住了贡嘎喇嘛的送信人，并找到那封信。格桑读完以后勃然大怒，当场击毙送信人。他立即着手动员巴塘民兵攻打背叛了他的贡嘎喇嘛。情况很快就变得更糟了。

格桑一心想着惩罚背叛者，便派遣我父亲所在的民兵队，跨过金沙江往南向盐井进发。但格桑不知道的是，贡嘎喇嘛已经得知这场迫近的袭击，他动员了盐井的民兵队，更要紧的是他还获得一支驻扎在芒康的西藏军队的支持。接着他们为格桑设下圈套。

格桑和他的士兵毫不知情。当他们跨过金沙江并朝南往盐井方向行进的时候，注意到远处一座山下有西藏政府的军队。他们并没想太多，因为藏军的主力基地就在那排山脉后面，而且这里本来就是西藏本土的一部分。但当他们朝通往盐井的山路走上去时，却遭到部署在上方的盐井民兵的重火力袭击。

巴塘民兵意识到地形对他们不利，于是立即往山下撤退。刚到达山谷，他们惊愕地发现刚才那些西藏政府军正从侧面朝他们射击。这些西藏政府军还占领了巴塘民兵的后方，阻止他们撤退。在部分民兵的掩护下，政府追兵的注意力分散，格桑的主力军得以渡过金沙江脱逃。

当战败的消息传到巴塘时，我们全家立刻陷入担忧，因为来人告诉我们，父亲也在那支后卫掩护队里，而且其中好些人已经战死。（我们也得知那些战死的巴塘民兵被西藏政府军砍下头颅，悬挂在芒康的驻军处示众）。这是一段令人痛苦的回忆。当返回的巴塘民兵主力进入村子的時候，我和母亲望眼欲穿，希望能看到父亲的身影。但父亲却没有出现。

当最后一位掉队者都回来以后，母亲开始大哭。她对我说，父亲肯定已经死了。她为父亲做了最后一次祷告，然后告诉我，从此以后我要接替父亲负责家里每天清晨的祷告仪式，包括清洗及盛满供佛用的水碗和酥油灯。我为能承担一个男人的责任而感到骄傲，但同时也非常伤心和愤怒。我无法接受父亲已经死去这件事。我记得当时对佛堂里的保护神起誓，要为父报仇。我还每天对佛祷告，希望他告诉我杀死父亲的人姓甚名谁。然而幸运的是，我们的悲伤很短暂。几周之后，一个来自芒康的商人告诉我们，父亲还活着，只是受了点伤；我们的悲痛转眼就变成了兴奋。父亲的腿在战斗中受了枪伤，后来被送往芒康医治。他的伤势并不严重，现在已在好转，很快就能回家了。

但格桑面对的难题却在继续增加。西藏政府军并不满足于将他赶走而已，而是一直追过了金沙江，跟盐井民兵队一起，开始攻打巴塘。格桑的民兵迅速在村外集结，阻住了西藏政府军，但却无力将其击退。战斗持续了三个月（大约自1932年4月中起至7月），双方僵持不下。这场战斗延续太久，距离又那么近，我甚至学会了分辨不同的枪声。我记得西藏军队使用的英式枪跟我们民兵队用的中国枪发出的声音不一样。

一直到有消息说刘文辉已从康定派军前来收复巴塘了，僵局才突然结束。格桑原本指望刘文辉忙于应付四川政敌而没空注意他，但他失算了。当消息传来说刘文辉的军队已经快到进村的山口时，格桑意识到大势已去，于是带着二十几个士兵逃跑了。我们后来听说他去了云南，又在那里回到南京。我完全不知道他跟他的国民党上司是怎么解释的，但一段时间以后，格桑又在中国政府里担任了要职。但对留在巴塘的人来说，接下来的日子可不好过。

刘文辉的兵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巴塘。当他们靠近巴塘时，西藏政府军也从金沙江退回芒康的驻军基地。我们再次处于国民党当局的直接统治之下。他们将民兵队首领杨森和另外两个头人斩首，以为报复。

我没有亲眼见到处决，但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当时我正和杨森的儿子玩耍，他叫达瓦，我们正在砸一棵大核桃树上的果实。就在我们一边大笑一边开心地朝树上扔石头的时候，我听到几声枪响，但没有在意。战斗已经结束，我以为那不过是谁在测试来福枪罢了。几分钟之后，一个村里的人看见我们，把我叫过去。我一见他的神情就知道有什么不对劲。那人压低嗓门告诉我，不要带达瓦从原路回家。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达瓦的父亲刚被处决，行刑地就在那条路上。我当然照他说的做了，但这个消息让我感到既震惊又憎恶。

后来我知道了行刑的细节。死囚的双手被绑在身后，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告牌，他们被带去游街之后遭到枪决。但他们慷慨赴死，高唱《新康藏之歌》，蔑视那些汉官。

行刑之后，巴塘恢复了正常，我也回到了学校和家庭的日常事务中。（此后不久，芒康的西藏政府放我父亲回家了）。但是，对这场杀戮以及刘文辉的统治，村民激愤的情绪高涨。我恨死了刘文辉，渴望有一天能报仇。我还梦想着追随这些英雄的足迹，为争取康巴人自治的权利而奋斗。这段经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我就渴望成为像格桑泽仁那样受过教育的现代藏人。

## 洛桑顿珠的政变

几年之后我们又有一次争取自治的尝试。这次，我家的参与更直接。

一天放学以后，父母告诉我，我的舅舅洛桑顿珠要从南京来了。跟格桑泽仁一样，他也在我们的本地学校读过书，又上了中学，最后加入了国民党。几年以前，他被任命进入中国政府的蒙藏委员会工作。我感觉与他特别亲近，因为他的女儿过去八年都住在我家，感觉就像我妹妹一样。得知他要来的消息时，我非常兴奋，迫不及待想见到他，因为我早就听说过好多他在内地的成功故事。

他于1935年抵达康定，与他同来的还有两个藏人，分别是嘎然喇嘛和邦达多吉。<sup>1</sup>蒋介石派他们来劝说当地藏族首领抵抗中国共产党的红军（当时红军长征正经过康区，最终会抵达延安），并扩大西康地区国民党的影响。但是，跟格桑泽仁一样，他们也有自己的打算，即消灭当地中国国民政府行政机构，让康巴人自治。

---

1 嘎然喇嘛（即诺那活佛——译注）的家乡在康区的类乌齐县，位于金沙江以西，属西藏政府管辖。在1917年的汉藏战事中，嘎然喇嘛支持中方，因此遭到西藏政府逮捕囚禁。1924年，嘎然喇嘛成功逃到中国，去了南京。到二十年代末期，他已是蒙藏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于1935年受命前往康区。

邦达多吉是富裕强大的邦达仓家族的一员。他们来自康区的察雅，也是受西藏政府管辖的地区（在芒康以北）。他的父亲是拉萨显赫的商人，因此西藏政府让他的一位兄弟做了政府官员，这通常是只有西藏世袭贵族才能享受的特权。1934年，邦达多吉发动了一次起义，成功控制一个藏军团部以及其中所有来福枪和大炮。但后来并没有发展出更大规模的反抗，于是当西藏政府军向他开进时，邦达多吉就带着手下和所有缴获的武器越过边界去了巴塘。巴塘中国驻军司令同意他留在那里。西藏政府要求蒋介石驱逐邦达多吉，遭到拒绝。——戈尔斯坦、喜饶、司本石初注

舅舅经巴塘以北的西藏重镇德格抵达巴塘。他的计划和格桑泽仁类似。他先是获得了德格地方王的支持，后者同意以民兵支援他的行动。接着他着手以最低调秘密的方式组织巴塘僧人和民兵队。在他做这些事时，邦达多吉将准备好他的民兵队。等准备工作就绪、巴塘的僧人和民兵都准备好战斗以后，舅舅就会发起里应外合的袭击。起义将从巴塘开始，邦达多吉和德格的民兵都会参与援助。理论上这是个不错的战略，但不幸的是，他的盘算落了空。

舅舅抵达巴塘外围后，意外地被当地中国国民党驻军司令傅德铨设的关卡扣押。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傅德铨知道舅舅的计划，但他显然因为某件不相干的事而变得警觉。他们扣住我舅舅，不准他进入巴塘。

舅舅想尽一切办法进城，最后他坚持要见他八年没见的女儿，否则就不离开。国民党驻军不打算理他，但最后还是同意让我父亲把他女儿带到关卡来。父亲来到以后，洛桑通过他向巴塘相关领袖传达了有关起义的消息。然后他假装回内地，但其实只走到了下一个中继站。他打算等巴塘的僧人和民兵都准备好协助他后，就伺机潜入巴塘。

当邦达多吉的民兵队首领得知舅舅被阻在巴塘外，他们等不及舅舅和德格的民兵，就直接发起进攻了。他们实在应该等待的，但却没有。也许是因为过于自信，或者他们担心风声已经走漏，不想给国民党军队增援的机会，又或者他们只是想独揽胜利的功劳。不管基于什么理由，他们独自发动了起义。

他们说服巴塘寺院里的大活佛拉嘎喇嘛出面，邀请当地国民党官员到寺里来。当傅德铨带着他的警卫抵达以后，洛桑像格桑泽仁曾经做过的那样，立即将他们俘虏。洛桑要求傅德铨命令他的驻军缴械投降，傅德铨同意了，但坚持必须先把他放回去才行，他说如果不是当面下令，他的手下是不会相信的。藏人不想放他走，但也希望尽量避免与驻军发生正面冲突，因为那样可能造成惨重伤亡。傅德铨驻守康区已经很长时间，对藏地习俗也非常了解。就在双方继续讨价还价之时，他想到一个聪明的花招。

傅德铨利用藏人对保护神力量的信仰，告诉他的囚禁者，他愿意在寺里最重要的保护神面前起誓，回驻地后三天内让他的士兵交出枪械。如果我那位见过世面的舅舅在场，他们多半不会放他走，但当时那些藏人首领不相信任何人有胆在神灵面前撒谎，于是同意了。

傅德铨回到驻地，三天以后驻军却毫无动静。西藏民兵重申，要对方立即交出枪械。傅德铨再次用计骗过藏人。他以十分友好的态度说，自己一定信守诺言，但他需要一点时间，因为驻军内部为该从东路还是南路离开巴塘起了分歧。傅德铨建议，最好能请拉嘎喇嘛前来驻地，为他们做一次占卜决定。拉嘎喇嘛不顾众人劝阻，依言前去了。

这一去铸成大错。拉嘎喇嘛刚到驻地，傅德铨就把他抓了起来，利索地扭转了局面。接着他威胁当地僧人和民兵，如果继续反抗，就会杀死拉嘎喇嘛。就这样，他成功地解除了邦达多吉的民兵队与当地僧人和民兵之间的联盟。他深知当地人笃信拉嘎喇嘛，准确判断出他们不会忽视这个恐吓。就这样，巴塘当地武装全数退出包围，只剩下邦达多吉的民兵队，去面对人数众多又久经沙场的国民党驻军。

眼见形势转而对他们有利，驻军预备主动突袭。作为备战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举行了一种可怕的仪式来增加勇气和信心。他们把一个藏人俘虏绑在院子中央的木桩上，然后轮流用刺刀戳他。当囚犯的痛苦尖叫声变得让人难以忍受之时，他们就把他的嘴巴塞住。刺刀戳向他身体的每一处，但又不会太深，因为这个仪式的目的是让数百位士兵的刺刀都能沾上活敌的鲜血。他们相信这样能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带来好运。

傍晚，那个俘虏死掉了。深夜，汉族士兵冲出驻地，袭击邦达多吉的民兵队。那是一场激烈战斗，伤亡惨重。八十五位驻军和十五、六位邦达多吉的民兵战死，邦达多吉的武装退回位于「博」(Po)的大本营。骑马去那里要两天。

傅德铨并不打算乘胜追击，反而立即进入邦达多吉在巴塘的庄园里抢掠一通。他先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走，再把其余如衣物、茶叶等没那么有价值的东西装了好几箱摆在外面，让巴塘村民拿走他们想要的。

遗憾的是，村民争先恐后地开始了抢夺。因此，傅德铨赢得了双重胜利。他在邦达多吉的庄园里发了笔横财，又精明地通过将剩余财物分散给村民的方式，间接让当地人参与到抢掠中来，淡化了此事中的汉藏对立。（但邦达多吉的民兵也有收获。他们在撤退途中去傅德铨的私人寓所带走了他的夫人做人质。两方做了交易，傅德铨归还了邦达多吉的部分财产，也没有对他的任何手下实行报复。）

这场战斗打响之时，我舅舅还在下一个中继站那里。听说了战败的消息以后，他立即去见邦达多吉。邦达多吉本人当时没有跟民兵队在一起，而在巴塘东边的藏地游牧区理塘。他们打算重新部署，周到地配合彼此的行动，然后再试一次。巧的是，傅德铨刚好也改变了主意，同意让我舅舅回巴塘。抵达巴塘以后，洛桑舅舅表面上跟傅德铨维持着友好关系，暗地里却在筹备着两个礼拜后的另一次起义。

巴塘四面有高墙，马跳不过，但人却爬得过去，因此有傅德铨的军士小心看守。舅舅和邦达多吉准备好以后，他们决定不采用正面攻击，而是从围城开始。这样一来，居民和士兵都没法离开。更重要的是，这样就切断了城内柴火的来源，因为柴火通常都是用驴从周围的山区里驮回来的。

几周的僵持中偶尔有零星枪战，但情势几乎没有进展。接下来，舅舅和邦达发动了三次直接袭击。在第三次尝试中，邦达手下大约十五个民兵成功越过围墙，一路杀到驻军基地附近。那里立刻爆发激烈战斗。一时间，守军的情况似乎不妙，他们甚至已经决定弃城而逃。傅德铨在驻地建筑四周浇上汽油，正准备点火，一位娶了当地藏人为妻的汉商劝傅德铨不要走，说如果傅跑了，他和他手下的汉人一定会被藏族民兵杀死。于是傅德铨改变了主意，驻军继续战斗，并且逐渐开始占上风，因为藏人先锋冲入城中后，既没有后援前来，也没有村民支持。国民党士兵很快就将那些闯入的藏人杀的杀，赶走的赶走。对那些已经负伤的藏人，国民党士兵用石头将他们砸死，以节省子弹。

这次战败并没有结束围城，舅舅和邦达多吉正计划着第四次袭击，这时消息传来，中国中央政府派来的一支军队已经开到巴塘以东的当拢山口（Dunlung Pass）。此时是1935年夏末，共产党的红军正在进行著名的长征，他们途径康区的许多藏族地区。尽管红军没有进入巴塘，却穿越了巴塘东边的山脉。我还记得，当时听说一些偏远地区的村民还抓到过几个掉队的士兵。<sup>2</sup>

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命令傅德铨和舅舅停战，一起帮他追击红军。这时舅舅感觉他已没法继续反抗当地汉人军阀，于是决定停止战斗回内地。然而战斗的终结，却也是我生命中新篇章的开始。

我才十四岁，但早在战斗停止以前我就为自己的人生做了重大决定。我想追随格桑泽仁和洛桑顿珠的足迹，去内地读书，这样我也能成为带领藏人争取自由的领导者。我一点也没因那次战败而灰心丧气，反而为这样的尝试而感到自豪。我还记得邦达多吉的民兵尝试第一次攻击时我的心情。当时他的士兵每五步一岗地守卫在从村子到寺庙的路上，个个神态严肃，仪表堂堂。看到这一幕，我很为自己的人民自豪。我还记得格桑泽仁对天鸣枪，并向世界宣布巴塘从此将由藏人作主时我内心的无比激动。我想成为像我舅舅和格桑泽仁那样的人，所以当我第一次听舅舅提到要离开的时候，我热切地恳求他带我去南京上学。

---

2 多年以后，平汪在1950年见到解放军的贺龙将军。贺龙告诉平汪，他的部队在长征途中穿越巴塘东边的山脉时，他曾看见巴塘。贺龙开玩笑地对平汪说，在他的地图上巴塘是个大镇，所以当他亲眼见到巴塘其实只是个弹丸之地时，非常吃惊。两人都哈哈大笑。这件事给了平汪灵感，他后来为此作了首诗：

在巴塘的当拢山口  
贺龙将军一低头  
两河间那块宁静简朴的土地  
天哪，就像是一小粒青稞

——戈尔斯坦、喜饶、司本石初注

他大笑着说，他还不打算回内地，只是要去康区另一个地方看望同事嘎然喇嘛，当时他生了重病。舅舅说他几周后就会回来，叫我不必担心。但我却很担心。我现在很清楚地知道，我最想要的就是去内地接受教育。我并不只是因为格桑泽仁和我舅舅敢于反抗汉族军阀才仰慕他们。我仰慕他们是因为他们受过教育，见过世面，有新式思想，还因为他们和我一样深信康区应由康巴人来治理。所以去内地读书这件事成为我梦想的焦点，我担心舅舅说很快就回来只是为了安慰我。

我越是担心舅舅不会回来，越是深信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就会失去内地读书的唯一机会。于是当我得知舅舅已经离开之后，便决定离家出走去半路找他，让他带我一起走。我说服了一个年轻朋友跟我一道。在他的帮助下，我从家里的储藏室偷了些干粮给他，让他明天一大早带着食物来找我。第二天我很早就起来了，到约定地方等待，但我朋友却没有按时前来。我又等了几分钟，还是不见他踪影。我决定不要浪费时间去找他，就自己出发了，没有食物，更身无分文。

我用最快的速度走到下一个中继站，抵达时又饿又累。但还是迟了一步。客栈老板告诉我，舅舅已经离开那里了。我非常沮丧，想立刻去追他，但客栈老板说服我吃点东西，先歇一晚。他答应我先派人骑马去给舅舅送信，告诉他我在这里。我不知道的是，他还派人去我家送了信。

第二天一早，我舅舅先来，接着我父亲也来了。舅舅被我的恐惧给逗乐了，再次向我保证他很快就会回巴塘，而且等他最后回内地的时候，一定会带我走。我父亲也向我保证会让我去内地读书。于是我感觉好多了。我跟父亲回去，虽然还有些许的怀疑，但我在内心深处是相信他们的。现在我感觉一切只是时间问题。

跟父亲骑马回家的过程是段痛苦的回忆。他只带了一匹马来，所以回去的路上我坐在他身前的马鞍上。一边骑，他一边问我究竟为什么要从家里逃走。我想了一下要不要说实话，最后决定应该向他坦白。所以我对他说，我离开的主要原因是想去内地上学，就像舅舅曾经那样，但我也告诉他，我在家里生活很不开心。

也许这么做显得我有些放肆失礼，但我对父亲直言说他喝太多酒了。我提醒他，从芒康回来那天——那时我们都以为他死了——他已是酩酊大醉，几乎要从马背上摔下来。我阿姨不得不用手捂住他的嘴，免得他大喊大叫的辱骂声让汉官生气。我还说我不喜欢他喝醉以后打妈妈。所以我说我之所以离家出走，也是因为这些事。

父亲什么也没说。我脸朝着前面，看不到他的表情，所以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沉默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突然我感觉脖子后面有什么温暖湿润的东西。我从马鞍上转身一看，惊愕地看到父亲的眼泪喷涌而出。我从没见他哭过。

到家之后，我翻来覆去地想，讲那些实话到底对不对。我不知道答案，但话都已经说了，我的生活也将我带往新的方向。舅舅是个守信的人。他回到了巴塘，等战斗一结束，就如约带我去内地。不管怎么样，之后近十年我都没有再回巴塘。

## 学校生活

我们骑马离开巴塘前往内地。我们这一小队人包括舅舅、他的女儿和妹妹、一个仆人，还有我。由于舅舅担心刘文辉抓他，于是在旅途的第一段，从巴塘到刘文辉位于康定的总部途中，他将自己装扮成商人，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大约三十几头满载货物的牦牛。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白日梦，幻想内地的学校是什么样子。记得当时我无忧无虑，非常兴奋。我就要接受新式教育了。我迫不及待地希望一切赶快开始，好让我接触新世界。

到了康定，舅舅把牦牛送回去，我们从那里开始步行。这段路程就像噩梦一样。我们避开大路，挑那些偏远危险的山路和步道，往往走得精疲力尽。舅舅雇了两个挑夫把两个女孩背着。我们穿越的地方通常没有村庄，这时就只能靠一点食物走上一两天。舅舅的脚上走出水泡，肿了起来。我们走了大约十二天才到乐山，又从这里乘船直达重庆，这才离开了刘文辉的势力范围。

到了重庆，我们就是在汉地了。刚一到达，舅舅就让我们换上汉人服装。他也让人把我们清理干净。我们在山路里走了好几个星期，两个女孩的头发里全是虱子，舅舅雇了个当地妇女来帮她们洗头。（最后我们都不得不剃头。）但当时我一点也不介意。

置身于这个奇妙的新世界中我欣喜若狂。那时候的我天真又好奇。我从来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地方——到处都是人，建筑大得像山一样。舅舅第一次带我坐车兜风的时候，我看到窗外的景象飏飏向后跑，还以为是那些建筑在动呢！让我大为惊叹的是人力三轮车，这是我既没见过也无法想象的东西；还有无数贩卖着稀奇古怪玩意的商店。尽管我在小学里学过中文，但这里的人讲话很快，我理解起来很困难。一

开始我只能进行简单的日常生活对话，后来连这都费力。显然我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但起码我已经来到现代世界，我爱这里。十四岁这一年，我觉得人生终于开始了。

我们住在舅舅租来的一栋房子里，同时等待着乘船沿长江下南京的安排。他白天去城里另一区工作，我们就在屋子周围玩耍，在汉族餐馆里吃饭。

虽然我后来认为汉餐很美味，但当时我只觉得它们很奇怪，而且无法让我饱足。在藏地我们总是吃很多酥油和肉，但我们去的汉族餐馆却主要提供米饭和蔬菜，很难让我们吃饱。我每次都能吃大约六、七碗米饭（女孩儿能吃五、六碗），这让餐馆工作人员大为惊讶。事实上，就算吃了那么多饭，我们还常常在下午去街上的小贩那里买饼子吃。

在重庆两个礼拜之后，我们终于买到了去南京的船票。舅舅暂时不能和我们一起走，但他特别请船长照顾我们。这次旅途大约花了四、五天，我一点也不害怕。虽然我们穿着汉人的服装，但船上的乘客还是知道我们是藏族人。一路上很好玩。船长以前从没见过藏族人，对我们照顾得特别周到。他有时会邀请我们跟他和其他船员一起用餐，并且总是尽全力对我们好。我们的中文还没有流畅到能跟其他乘客交谈的地步，但我们互相之间聊了很多，全程都很兴奋。

到南京以后，舅舅的兄弟两口子到码头来接我们。他的兄弟是蒋介石的军校里第一位藏族学生，其妻子在蒙藏委员会当翻译，那是国民党政府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他曾在巴塘的教会学校念书，精通英文、中文和藏文。

我们即将就读的学校隶属于蒋介石的中央政治学院，这是蒙藏委员会下设的教育机构，目的在于培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士为政府工作。那里大约有三百名学生，其中有十五到二十个藏人（一些来自巴塘，一些来自班禅喇嘛的领地日喀则，还有几位来自康区和青海的其他藏区）。其余的学生包括蒙古族、维吾尔族、彝族、回族，还有从甘肃和青海边界来的汉族。

我们的中文实在太差了，连进学校的预备班都不够格，于是舅舅为我们安排了私人家教。南京的生活非常令人兴奋，因为总能见识各种新鲜事物。比如说，学校常常会播放有关抗日战争的宣传影片。我第一次看这种影片的时候给吓坏了，以为屏幕上那些飞来飞去的枪弹和大炮会打到我。但同时我也很懊恼，因为影片说些什么我都听不大明白。

我在家教那里学习非常用功，短短几个月就有了极大进步。很快我就能阅读简单的小说了。我还记得有一本小说把我逗乐了，讲的是一个俄罗斯的爱斯基摩人第一次去大城市，在城里的汽车和建筑物前目瞪口呆。这个故事让我感觉好多了，因为它让我有了可参照的经验。我边读边大笑，因为意识到自己刚到重庆和南京的时候，就和这个人一样。

我也给家里写信，但我一点也不想家，所以也不介意他们没回信。每个周末，南京的藏人都会聚集在我们住处吃东西、唱歌、跳舞，所以我也没有与自己的文化和习惯的饮食完全隔绝。七个月以后，我的中文有了长足进步，正式进入预备班。

学校采用军事管理制度，对每个人就像是对士兵那样要求。我们得穿制服。（我觉得非常有精神。）老师每天早上会到寝室检查，棉被必须折得边是边、角是角，就像从市场上买来的豆腐块一样。

国民党政府不仅支付了我们在学校的所有开支，还给每人一份津贴。我每月可以领八元钱（中国货币）餐费，还有另外两元杂用补贴。这份津贴很不错，而且是用银元支付的。学校的伙食也很好。每次用餐时我们都能领到一个分格的特制大餐盘，里面盛了一份带肉的蔬菜、一份净蔬菜和一份汤。此外还能拿碗盛米饭或馒头，想吃多少就能盛多少。

学校的军事管理制度也延伸到食堂里。领了餐盘就座以后，必须等一位军官吹哨后才能开始用餐。大约十分钟后，他会再次吹哨，不管我们吃没吃完都得停下。（我记得当时有一位从内蒙古来的男同学，他牙齿不好吃不了肉，于是总是把肉给我，我则把蔬菜给他。）我们吃得很快，但整体上说伙食非常好。

我们的课程包括中文、数学、历史和地理，教学时使用的是高阶汉语。一切都很美妙。我觉得能在这里读书是件幸运的事。有时我会想起在巴塘读小学时的情景，那种差异让我想笑。跟南京的学校比起来，巴塘的学校实在没有教什么。

有时候，一想到家乡的简朴村庄跟这个蒋介石设在中国首都的学校之间的对比，我既为自己的经历感到惊讶，又十分自豪。还让我激动万分的是，我有机会近距离见到蒋介石。

每周日早上，学生们都会集合，纪念推翻满清王朝的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每个学生必须到会，国民党高级官员也常常出席。有一次蒋介石亲自致词，我离他和蒋夫人只有几步之遥。他有一道窄窄的胡须，腰间挎一把长剑。我觉得他很英俊，准确地说是优雅。

我上学没多久，日本人就朝南京逼近了。这已不再是屏幕上的画面，而是兵临城下。1937年7月，日本人攻打北京，8月攻占上海。几个月之后，为安全起见，蒋介石下令将政府迁至西部的陪都重庆。我们学校也要一起搬。但我们没有直接去重庆，而是逐步朝西迁移。

我们先在安徽呆了几个月，又搬去江西，再从那里转移到长沙附近的芷江。转移过程中，生活条件变得很糟糕，特别是伙食。但我们常常都没课，加上纪律松弛、军事化管理放宽，学生有了更多时间聚谈，并且组织起来。

我经历了第一次反政府批评行动。事情的起因是，一些年纪较长的学生领袖抱怨校领导挪用了原本拨给学生的款项。他们还讲国民党政府的坏话，说大多数高官都只想捞钱，尽管当时政府在日本人面前节节败退，大部分人民的生活条件都极差，但政府内部的腐败却日益猖獗。由于这次对生活条件的抗议，中央政府派专员前来调查，并做出相应调整。这是我第一次见识政治运动，令我印象深刻。我同意学生领袖们说的话，也钦佩他们的勇气和信念。

由于我们经常没有正式课程，一些学生领袖就教大家唱进步歌曲。这些歌都不是国民党政治课程的一部分。我还记得其中一首歌的歌词中

说：「工农兵商应联合起来救亡图存。」这在现在看来没什么，但当时却是非常进步及革命的观点，因为它说救国也需要非政府因素的努力。

我们积极参与反抗日本对中国的压迫和剥削。尽管我反对刘文辉在康区的统治，但我对整个中国还是有爱国心的。大约这个时候，我看了一部非常精彩的俄国宣传电影，讲述一位年轻勇敢的飞行员的故事，充满空中大战和英雄事迹。我突然想到，我可以加入中国空军来抗日报国。（我幻想中的计划还包括飞回康区轰炸刘文辉的康定总部，为康区和康巴人重拳出击！）

我在巴塘的朋友达瓦，就是父亲被刘文辉处决的那位，也到我们学校来读书了。我很快就说服他跟我一起去当飞行员。我们都很年轻，又憎恨日本人，而时局变幻无常，仿佛一切皆有可能。现在回头看那段经历，让我惊讶的是，在计划最终流产以前，我们竟然走出那么远。

我们做的头一件事就是给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写信。信中说我们是两个藏族人，因为对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义愤填膺，所以想当飞行员参加抗日。我们不知道这封信能否到他手上，所以决定去长沙和他面谈。但这计划有个难处。

达瓦和我几乎没钱，一开始我们根本不知该如何支付旅费。但达瓦想到了解决方法。他当时已经和格桑泽仁的妹妹订婚，并且带来一个金戒指。我们把订婚戒指卖了二十五元钱，又找其他巴塘来的学生借了点钱，终于凑足旅费。

我们到学校请假，告诉校方达瓦的未婚妻到了湖南，我们得去看她。由于此刻是战争时期，太多事悬而未决，校方根本没时间仔细审查这样的申请，于是我们轻而易举地获得旅行许可。一场令人激动的冒险旅程就这样开始了！

一拿到校方许可，我们就登上一列去长沙的火车，试图去见张主席。虽然没有成功，但我们见到了他的秘书。我想我俩一定给他留下了好印象，因为他请我们吃饭，还称赞道：「你们两个来自边疆，有这样的勇气和决心，实在令人惊叹。」他还为我们写了封介绍信给国民党空军副

总司令毛邦初，同时发给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校长周志柔。我和达瓦在长沙热切盼望着回音。但两个礼拜以后我们开始不安，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亲自去武汉的空军基地找毛邦初和周志柔。

此时我们的钱快用光了。表面上看来我们像有钱人，穿着学校制服显得神采奕奕，但那不过是假象。我们的钱连吃饭都不够用。后来穷到没办法，决定住在武汉一家豪华饭店里，因为这里只要求客人在离开时结帐，不像在便宜小旅馆里那样，要每天结。但我们还是得花钱吃饭，于是我们在街上买一、两毛钱的馒头或最便宜的面条带到公园去吃。这样，我们得以掩饰自己的窘迫，每天回饭店时都还能保持一副显要富有的样子。

我们走了很多路才找到空军学校，在此期间我们的钱越来越少了。但一路上看到的很多情景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们经过豪华餐厅，看到有钱人在里面用餐，有时我忍不住停下来透过窗户紧紧盯着食物看。我们那么饿，他们却拥有那么多。但我们也看到了另一种人生。我们常常见到睡在大街上的穷人，有一次还看到一个妇女怀里抱着早已死去的婴儿。我无法不去思考富人和穷人生活条件的鲜明对比。我对那些住在街上的人有种亲切感——达瓦和我的处境离他们不过一步之遥。

最终我们的经济状况陷入绝境，但根本没想过回学校，因为我们深信马上就会接到答复，很快就能开始飞行员训练了。这时我俩总是饥肠辘辘，透过餐馆窗户看到美味食物，就会不由自主地流口水。有时我们一天只能吃一两个馒头。所以我给已经在重庆的舅舅写信，告诉他我们想加入空军，请他寄些钱来。等待中，中国政府在武汉召开了一次会议，格桑泽仁也要参加。于是舅舅通过他把钱带给我，格桑派他的秘书来找我们。

格桑泽仁邀请我们去一间很好的餐厅见他。我们一到那里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饥饿是最好的调味品，这是我一生中吃过最香的一顿饭。格桑享受着看我们吃饭的乐趣，然后他变得很认真，严厉地责备了我们。他说我们不负责任，目光短浅，他绝不允许我们加入空军。他给空

军学校的领导写信，说我们俩没有资格入伍，因为我们是藏族少数民族学生，到中国内地是来学习，不是来打仗的。他说入伍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一旦受伤，投入在我们身上的培训和教育就全浪费了。而且，万一战死，藏人就可能觉得责任在中国当局。他希望我们跟他回重庆，不要再想这件事了。

达瓦此刻已经是格桑泽仁的准妹夫，所以他同意了，但我不同意；最后他说会带达瓦回重庆，我则可以自己想办法回去。讽刺的是，第二天我们就收到了飞行员训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说已将我们视为「特例」，不必参加入学考试。但已经太迟了，我拿着舅舅寄来的钱，不情不愿地回到学校。我觉得很尴尬，因为走以前我已经对大家说我要去当飞行员打日本人。

回去后不久就有考试，我自然是全无准备。但我的运气很好。班主任老师王晓雄很喜欢我，准许我写一篇武汉见闻来代替考试。我迫不及待地答应了。我的脑海中满是武汉的画面。我挑了两件事来写。一是日军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二是中国富人和穷人生活条件的天壤之别，有钱人在餐厅里欢笑，穷人却在外面的大街上等死。我写下看到这些情景时的心情，以及它们如何改变了我的想法。

我不知道的是，原来我的老师支持社会主义的政治观念。他的一些朋友已经是共产党员，他非常喜欢我写的文章。他背着我改正了文章中的小错误，然后寄给芷江一份报纸，报社竟然发表了。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直到有一天王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十元稿费和一份样刊。这是我第一次通过写作获得报酬。那年我十六岁，十元在当时是不少的数目，足够支付一整月的基本生活开销。但这篇文章的意义远远大于金钱。

武汉之行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章发表以后，其他学生突然开始注意起我来。我不再是那个宣称要加入空军的奇怪的藏族人，而是个有想法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我的言论既感觉惊讶又很高兴，认为那是很民主的观点。我的思考明显开始集中在有关社会和政治的议题上，

由于老师和同学都把我的观点当一回事，我也更加热切地思考这些问题，并且相信自己的直觉。

这期间，学校还在不断向西转移，先是来到贵州首府贵阳市，最后终于在1938年末抵达重庆。在南京的时候，校方总是密切留意我们阅读的东西，也限制我们获得其他读物的途径。但随着我们四处搬迁，能接触的各种读物就越来越多了，包括共产党刊物。重庆的共产党刊物比南京多很多，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设有分部，共产党的新华社也在那里。我还发现我在教师中已有一位盟友，就是王老师。

自从我的文章发表以后，王老师就开始关注我。他说他觉得我的想法和其他大部分学生都不一样。他想尽办法为我找来各种进步的共产主义刊物，其中包括斯大林和列宁的书籍和文章。他常常会在晚上找个借口把我叫到他房间去，这样其他学生就不会发现。他给我的第一本书是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第二本是对我产生巨大影响的小薄书——列宁的杰作《论民族自决权》。虽然王老师说他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但显然他有在新华社供职的共产党朋友，因此我开始有机会接触一套全新的观点和社会分析理论。王老师给我的读物彻底改变了我作为一个藏族人看事情的方式。

斯大林和列宁的著作给我最大的触动是，里面提到的事情都是我已经知道的。我见过富人和穷人间的巨大差距。我知道一些团体如何压迫和控制少数民族，就像军阀刘文辉在巴塘和康区所做的那样。我从来不知道像列宁和斯大林这样的大思想家也思考过类似问题。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观点。他认为每个民族都有保留自己民族特征和争取自由的权利，也有权决定本民族的政体，不管是独立存在还是以平等的身份加入另一个国家。我崇拜苏联，因为所有民族在苏联都享有平等权利；每个民族都是一个单独的共和国，拥有自己的政府。当列宁说掌权的民族与不掌权的民族间必然有冲突时，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在巴塘长大并且熟知当地情形的我，知道强势民族往往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压迫弱小民族，而弱小民族总是奋起反抗。我

有时候感觉列宁仿佛知道我在想什么，知道我最关心的是什么。我还觉得共产国际这个概念非常振奋人心，又具有说服力；在共产国际中，共产党人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政治实体中的平等一员。这些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理论的最初接触，影响了我其后整个人生的思想。我开始相信，解决西藏的问题首先需要一场共产主义革命，接着西藏（或康区）应以平等的身份加入共产国际。

由于我早先在写作上的成功，1939年初我成为学校公告栏的编辑，那里每周都会张贴新闻。由于贴什么文章都由我决定，所以我总是重点选择那些我感兴趣的话题。有一天，一位来自安多（甘肃省的拉卜楞寺）的藏族人来找我，他叫根曲扎西（中文名字叫吴振纲）。他比我大两个年级，他说他常读公告栏，很喜欢我选的文章。接着他拐弯抹角地问我，最近有没有看什么新书。我知道他的意思。由于他是藏族，我觉得可以信任他，于是我说：「有，我有看。」他又问我喜欢哪些书，我也告诉他了。他说：「我也在偷偷读这类书。」那以后，我们变成特别好的朋友，常交换想法，分享彼此的书籍。

另一位名叫阿旺格桑的巴塘人也加入了我们的核心小组。他幼年丧父，母亲又无力抚养他，所以他在巴塘的美国传教士那里受教育，并住在美国人的孤儿院里。小学毕业后，美国人送他和另外两位藏族小孩一起到成都上中学。阿旺格桑告诉我，他们三人到成都之后，那里的汉族学生觉得他们既然从那么「落后」的藏区来，一定是些土包子。阿旺从前很喜欢讲一个笑话：汉族同学第一次带他们四处参观时，走到一间有一架风琴的教室里，汉族同学问他们以前有没有见过这东西，完全以为他们会说没有。结果，阿旺格桑不动声色地走过去，坐下，开始弹奏起来（他在教会学校里学过）。那些汉族学生非常惊讶地说：「这些野蛮小孩还真有两下子。」

在成都念完书以后，美国人又把阿旺送到我们在南京的学校。他比我大九岁，非常聪明——他会藏文、中文和一些英文，还能用藏语唱所有的基督教歌曲。他和我一样深切地渴望改变我们的社会和制度，我们在重庆变成了亲密的朋友和同志。

我的正式课业又开始了，但我越来越沉浸于课外阅读，以及对历史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学习中。我和根曲扎西等几位好友越是了解共产主义理论越是深受其影响。王老师也给予我们很多帮助，因为他总有新的读物给我们。例如说，他给过我们一本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我们阅读后一起讨论毛泽东在延安的生活，以及长征中的日子。

这是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机会，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如饥似渴地地阅读了这本书。此外我们还读了一本有趣的书，是关于一个记者的美国与俄国之旅。他写到向美国工人介绍共产主义理念，字里行间充满对俄国的赞扬。我们之间的共同点之一是，我们都读过列宁的民族主义观，并且深受其影响。他提到的事情似乎刚好符合藏族人的情况。我们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家，对于地主压迫平民或阶级间的区别、阶级斗争这些事思考得很少。我们重点关注着那些对自己的生活有最直接影响的理论。

新观念很是令人激动，最终在1939年，我们几个人决定在学校成立一个秘密的西藏共产党。我们给它起名叫「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创党成员仅有五位：根曲扎西、喜饶（来自拉卜楞寺）、玛甲顿珠、阿旺格桑和我（见图三）。我们非常严肃认真，誓言将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与藏族和自治相关的事业。

一开始我们的聚会总是秘密的，有时在公园里，有时在学校附近的树林中。我们探讨并辩论藏族人的自由，以及反抗压迫和联合所有藏族人的必要性。我们经常讨论进行什么行动是合适的，也着手做了一些简单的工作，比如将《国际歌》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歌曲翻译成藏文。我们也给斯大林和毛泽东写信，告诉他们我们成立了自己的党派，其主要目的是为康区和西藏带来民主与革命。

关于信中应该使用什么称呼，我们思考了很久。在藏族和汉族文化里，信件中的称呼都是很重要的。给斯大林的信我们是这样起头的：「全世界受压迫的无产阶级民族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给毛泽东的信我们是这样写的：「东方所有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我们

用了不同的方式称呼两人，因为我们觉得当时的苏联非常强大，今后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相比之下，我们觉得毛泽东会是在亚洲建立共产主义的领袖。

我们还决定要影响其他藏族学生的思想，于是成立了一个更大、更公开的非共产主义组织。根曲扎西和我认为藏族人应该成立自己的组织来争取藏族人的利益。如果我们联合起来，或许能为学校的藏人完成一些个人之力做不到的事。我们想到，反正我们这几个总是聚在一起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为什么不干脆将这个小组正式化呢？根曲扎西是安多来的学生中最年长的，安多学生都很尊重他。而巴塘人都愿意听我的。我并不是年纪最大的，但我很强的个性，他们都把我当回事。

我们讨论了许多我们试图解决的问题，最终决定了三件基本的事情：一、我们反对国民党政府任何形式的大汉族主义行为；二、我们反对国民党官兵在康区压迫当地人民的行为；三、我们要求学校提高藏族学生的待遇，特别是为藏族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根曲扎西和我吸收了大约二十来位藏族学生加入，将我们的小组命名为「西藏各地区学生四川联合会」。

1940年春，达赖喇嘛设在重庆的办事处为所有藏族人（以及一些汉人）举办了一次大型聚会，庆祝2月22日在拉萨为十四世达赖喇嘛举行的坐床典礼。我们也收到邀请，觉得这是正式介绍我们组织的最佳时机。我们为所有到场成员拍了照，整晚都在唱歌跳舞中度过。

我们的首次正式行动就是以上述三点向校方领导请愿，尤其是希望校方增设更多藏语课程，并且提高学校伙食质量。我们觉得学校在南京时的伙食比在重庆好很多。许多从巴塘来的学生都染上了肺结核。听说良好的饮食对治疗这种病有帮助，所以我们觉得学校应该改善伙食。另外，一些藏族学生因为没钱继续念书，所以不得不回去。除了这些问题，我们也希望更多人了解自己的组织，扩大其影响力，吸引更多组员。（在请愿书最后我们没有写下每个人的名字，落款处的签名是「几名藏族学生」。）



图三：1940年在重庆时，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成员与西藏各地区学生四川联合会成员的集体照。后排左起：达瓦（第一）、平汪（第三）、根曲扎西（第四）。前排左起：白玛（第二）、根曲扎西的妻子（第三）、阿旺格桑（第四）、喜饶（第五）、群培（第六）。

我们的请愿书显然引起了注意。

我们很快得知，学校的国民党书记龚北诚（音译）早就盯上我们这群人。他已经问过其他学生，那些藏族总是聚在一起到底在做什么？见我们频繁集会从事「社会」活动让他很不高兴。他对我们起了疑心，不久就把我和根曲扎西叫到他的办公室去。

「我想知道你们这些学生总是聚在一起，到底在做什么？」他很生气地说。「继续这样下去，你们的成绩必然一落千丈。学生在这所学校的任务就是学习。让学生结社不是这里的传统。确切地说，这是国民党的学校，不允许学生成立自己的单独组织。」

接着，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不准再聚会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拳头砸桌子。但这不但没有让我害怕，反而让我愤怒。我恼火地回应道：「当学生跟参与社团活动又不矛盾！我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正当请求，我们的组织也不止我和根曲扎西两个人而已，而是所有藏族学生的组织。就算你压制了我们两个，你也不可能让所有学生都沉默！」

「很好，」他说，「如果所有学生都参与了，那我们就跟所有学生谈。」

其后召开的大会更是充满火药味。龚北诚一上来就开始讲做学生的本分。他提醒我们的责任，又提到很多不准我们做的事。他越讲越激动，边说边用拳头砸桌子以强调他的重点。

一些学生被他的愤怒给吓坏了，有几个甚至紧张得哭起来。但我的愤怒不亚于他，答话时我也一拳砸在桌上。「你以为你在做什么？」他冲我咆哮。

「我在向你学习，」我回答。「你是我们的老师，我在仿效你的举动！」（他从未原谅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蔑视他。）

我的举动似乎给了其他学生信心，因为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不会听从或接受他的命令。他继续对我们骂不绝口，于是藏族学生全体起立，鱼贯而出。回到教室后，一些学生砸坏桌椅以泄愤。我们对为自己争取权利而勇敢地反对龚北诚的行为，感到鼓舞。

这次大会后，龚北诚再次把我和根曲扎西叫去他的办公室，直言不能让我们保留这个藏族学生社团。我们依然拒绝从命，并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们的行为，而不是我们的。我们跋涉千里到内地来学习，不仅远离父母，还要承受各种艰难，如此对待我们等于是压迫，绝对不能接受。（我那时才十八岁，但已经读过不少书，对我的知识很自信，相信我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又一次气冲冲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这次，龚北诚向蒋介石报告了此事。

蒋介石和许多国民党高官来参加了星期一学生与校领导的例行集会。刚开始，集会和往常差不多，但在集会结束学生也正准备起立离开时，校方突然通知所有在蒙藏委员会管理下的学生留下来。

其他学生离开后，校方让我们走上去坐在前排。接着蒋介石站起来，走到我们面前。他腰间挎着一把长剑，一只手随意握住剑柄，迅速扫了我们一眼。你能看到他眼里的恼怒，然后他开始训斥我们。

「中央政府为教育和培训你们投入了很多资金，」他说道。「我们从那么远的地方把你们带到这里，是为了让你们学习，好好利用我们教学上的有利条件。但你们不但不学习，还制造骚乱，挑战学校的权威。」

蒋介石很生气，因此话也讲得很不流畅。为了历数及强调我们做错的每件事，他的话显得短促而支离破碎。他假装是在对全体学生讲话，但很明显是在针对藏族学生。讲完后他面对着我们，眼神从我们脸上逐一扫过，看谁有胆量反驳他。我想，他是想看看我们接下来会作何反应。随着沉默继续，氛围也愈加紧张。接着，一位叫白玛的藏族学生（见图三）举起手，以学生在课堂上发言时的正式方式说：「报告校长。」

你能听到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

蒋介石四下搜寻是谁在说话，看到白玛以后，他慢慢走到他面前，让助理记下他徽章上的名字和学号。我们闯了什么样的祸啊？我们以前听说蒋介石的脾气十分可怕。据说他在步兵学校当校长期间，曾枪决过一些提出批评意见的学生。

我当时以为我们都完蛋了。但让我们惊愕的是，白玛继续讲了下去。他直视蒋介石说：「你批评我们荒废学业制造麻烦，但我们学习非常用功，也没有制造过麻烦。」

我想，有学生胆敢回话这件事就已经令蒋介石错愕。而且，虽然白玛在否定蒋介石说的话，但他的语气既不愤怒也不挑衅。不知他怎么做到的，但他让自己的语气显得仿佛是在赞同蒋，好像他们的立场相同似的。他说的话非常简单。白玛的中文不好，所以他的用词显得有些奇怪。让我们惊讶的是，白玛讲完以后，蒋介石看上去反而不生气了。他甚至还点了点头，仿佛在同意白玛，而且他好像被白玛的措词给逗乐了。当其余的人发觉蒋的怒气在消失时，一个向来以溜须拍马为能事的学生站起来，说他也一直在勤奋学习。现场的紧张氛围明显消散。

在那当下，白玛使我们转危为安。他是个有点奇怪的学生。事后我问他当时为何发言时，他说是因为蒋介石的话让他非常生气。但我又问他当时希望局面如何发展，以及他讲话时心里在想什么时，他说他也不知道。

如果白玛当时没说话，我真不知那次集会将如何收场。最明显的和解方式，就是藏族学生向蒋介石和校方道歉。但我们也是事后才想到这一点，当时根本没这么想，多半也不会这么做。我完全不知道那天可能发生什么状况。

所有藏族学生，包括我在内，都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根曲扎西和我都很清楚，我们的处境仍然不妙。学校知道我和根曲扎西是社团背后的组织者，很快他们就展开了报复。根曲扎西首先受到冲击。

根据校规，学生不能将妻子带来与自己同住，但根曲扎西还是把妻子带来，后来还让她怀孕了。校方正好以此为理由赶他走。学校让他立即带妻子回甘肃拉卜楞。由于的确有这样的规定，根曲扎西没有选择。但是，校方秘密给拉卜楞的国民党官员写了信，让对方不要允许根曲扎西再回来。就这样，根曲扎西前一天还在学校，第二天就不见了踪影。我们事后才得知详情。

这事以后不久，他们也把我开除了。有天晚上，校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让我交出徽章和领章，第二天一早就正式离开学校。他好像还讲了一些我如何没有遵守校纪校规的事，但我已经不太记得。当时我既惊讶又愤怒，完全没注意细节。

回到宿舍后，我召集了几位最好的朋友，告诉他们发生的事。我说：「根曲扎西被送回去，我也被开除了，所以你们得更加努力地工作，让我们的组织继续发展下去。」我又说：「我会住在重庆我舅舅的家里，所以不会离你们太远，还是能保持联系。」这时是1940年夏天。

被开除令我感到惊讶而受伤。我知道学校一定会因为我们引起的那些骚乱找我们麻烦，或是给我们纪律处分，但万万没想到会把我们开除。我以为他们顶多会把我暂时送回家而已。

我喜欢学校，从没想过不当学生的生活。一开始，这消息让我完全呆住了。但我毕竟那么年轻，又充满少年人的精力、希望和适应力，于是很快就找回了平衡。离开校园时，我发誓绝不悄无声息地溜走。我放开嗓门歌唱，假装对这世上的任何事都不在乎。我告诉自己：「你正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你现在已经知道为理想和信念奋斗必将付出代价，那就让它们来吧。」

# 索引

## A

阿波饶噶, 132  
阿乐部长, 146, 151, 157, 160–161  
安定门精神病医院(北京), 245  
安多多杰, 86

## B

八廓街(拉萨), 67, 152, 157, 159–160, 169  
八路军, 44, 45  
巴觉(礼仪性发髻), 151  
巴弥才旦, 96  
巴苏, 81–83, 111  
巴塘地下党(中共康藏边地工委), 123, 125, 309, 312, 338  
巴塘民兵队, 11, 12  
巴塘县党委, 129  
班禅喇嘛: 23; 与达赖喇嘛的矛盾, 129–140; 返回拉萨, 170–171; 毛的评论, 172–173; 参加人大会议并访问内地, 176–187; 试点改革, 194; 参加佛诞节, 201; 获释后看望平汪, 260  
白云峰, 157  
包尔汉, 219, 347  
邦达多吉, 15–19, 91, 95–96, 105, 126n, 131–132, 196  
布达拉宫, 67, 154, 193, 209, 290  
毕朔望, 82, 83  
《辩证法新探》, 287–288, 294, 387–388

## C

擦绒扎萨, 167  
擦珠仁波切, 110, 168–169  
察雅堪布, 155  
长征, 15, 19, 31, 52, 91

陈竞波, 130, 150, 157, 386  
陈明义, 207–209  
陈毅, 188, 189–196, 202  
陈云, 257, 260, 263  
赤江仁波切, 167  
茨丹央珍(平汪第二任妻子), 232n, 259, 288  
崔科, 134, 218–219

## D

大汉族主义, 32, 161, 210, 230, 262, 277, 289, 293  
大跃进, 214  
大昭寺, 67  
达瓦, 13, 26–28, 105–106  
《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王力雄), 296–298, 360–361  
达赖喇嘛: 十三世, 2, 3; 重庆办事处, 32, 55, 59, 60–61; 在亚东, 138, 146; 与班禅喇嘛的分歧, 139–141, 170–173; 见解放军, 155, 156; 罢免鲁康娃, 166; 访问内地, 175–191; 赴印参加佛诞节, 201–202; 出逃印度, 219; 「黑会」, 240–242; 派代表团访问中国(1979年), 261–263  
德国, 47–48, 63, 75, 84, 86; 投降, 88  
《东藏人民自治同盟》, 93–95, 99, 105, 127n  
道帛喜饶, x  
德格色, 194  
德钦, 91–93, 95–96, 99, 105–106  
邓小平: 50年代, 125, 128–131; 文革以后, 257–261; 祝贺平汪平反, 264; 派胡耀邦入藏, 267, 274; 作出批示, 282  
东藏民主青年同盟, 123, 125, 129  
地方民族主义, 210–212, 215–219, 280, 289

滇西中国共产党, 117

第穆仁波切, 169

杜琼仁波切, 174

多杰才旦, 286

## E

恩格斯, 125, 233, 294

## F

范明, 156, 157-165, 170-176, 182-183, 195-196

反右运动, 210, 219-220, 318, 345, 350

费德林, 42-43, 46-48, 76

冯文彬, 260, 263

佛诞节(印度), 201

傅德铨, 16-19, 89-90, 236

## G

噶厦, 66, 70, 86, 115, 151

噶冉阿西(平汪父亲), 9, 311

噶雪巴色, 110

嘎然喇嘛, 15, 20

甘丹寺(拉萨), 67

甘地, 78, 244

甘肃请愿, 271

高峰, 195

格达活佛, 132

格西曲扎, 169

《共产党宣言》, 230

共产国际, 30, 47, 119

恭布泽仁(海正涛), 91-93, 95-100

功德林扎萨, 174

贡嘎喇嘛, 11, 12

《国际歌》, 31, 47, 83, 114, 234, 360

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 27

## H

黑格尔, 233, 238, 243

贺龙, 19n, 128, 130, 255

赫鲁晓夫, 192-193, 342

何望波, 119

胡启立, 282, 286

胡耀邦, 174, 257, 260, 263-264, 266-271

华国锋, 267, 309

黄正清, 216, 241

霍奇昌, 105

## J

加尔各答, 113

嘉乐顿珠, 201, 258-260, 265, 278

《假如战争在明天》(苏联歌曲), 83

降曲(索康侄女), 207

江乐金, 110, 159, 167-169

江泽民, 288, 295

计晋美, 139, 166, 168, 179, 197

蒋介石, 15, 25, 34-36, 94, 154

蒋夫人, 25

基督教教会学校, 7-8, 23

金沙江, 1, 3, 12-13, 55-59, 66-67, 72, 88-89

觉沃佛像(拉萨), 67

## K

凯墨, 136, 138, 141-145, 152, 168-169, 384

《抗日战争与国际形势》(周恩来), 44

## L

拉嘎喇嘛, 16

拉鲁(西藏政府驻昌都总督), 112, 132, 367

拉萨青年社团, 168

丽江, 93, 101, 103-106, 113, 117

《理论研究资料》(杂志), 263

李井泉, 187-189, 195-196

李先念, 311

僕僕族, 103

梁选贤, 176, 340

「两个凡是」政策, 267

林彪, 318

《流亡中的自在》(达赖喇嘛), 156n, 180n, 184n, 215n

刘伯承, 125, 128, 130, 136

刘春, 183, 211, 232, 236, 340, 346-347  
 刘格平, 174, 176, 178-179, 183, 190, 197-198, 278  
 刘少奇, 175, 179, 225, 234, 255, 283  
 柳霞(土登塔巴), 152  
 鲁康娃, 153-154, 159, 163-164, 166, 173  
 洛桑朗吉, 86, 113  
 洛桑三旦, 179, 261, 264, 311  
 《论民族自决权》(列宁), 29, 212, 214  
 《论民族问题》(斯大林), 29

## M

马克思哲学史学会(洛阳), 294  
 曼德拉, 244  
 毛邦初, 27  
 蒙藏委员会, 15, 23, 34, 51, 111  
 湄公河, 1  
 米拉日巴, 238  
 缅甸共产党, 76, 80-83, 89, 113, 117  
 民族事务委员会(北京), 127n, 136, 138, 174n, 175  
 苗逢澍, 127, 339  
 慕生忠, 158, 161  
 牟霞代本, 60-62

## N

纳西族, 104  
 内蒙古, 24, 182-183, 278  
 尼赫鲁, 201, 244

## O

欧根, 117-119, 124, 384

## P

帕拉(大管家), 219, 241  
 平康(平汪儿子), 221, 245, 311, 344  
 平妮(平汪女儿), 245  
 平阳(平汪儿子), 245, 253, 256  
 彭京(平汪儿子), 245-246, 253-254  
 彭真, 211, 285

## Q

恰巴·格桑旺堆, 159  
 强俄巴, 114, 132  
 乔西(印共领导人), 111  
 切玛(新年仪式), 185  
 曲德寺(巴塘), 2, 10-11, 207  
 曲扎, 126  
 曲洛(拉萨藏人), 137  
 群培(平汪的弟弟), 69, 86, 97-101, 104-106, 255

## R

饶噶厦, 154, 164  
 热振事变, 109, 113  
 《人民日报》, 233  
 任荣, 267, 270  
 日本, 25-28; 分析战局, 75-76, 86; 投降, 88

## S

桑都仓家族, 77-78, 158  
 桑颜色, 136  
 色拉寺, 67-68, 110  
 色新学校, 167  
 十八军, 127, 129, 133, 147, 155  
 苏联大使馆(重庆), 42-43, 46-47, 79, 92  
 孙中山, 11, 25, 94

## T

塔钦巴布, 84, 111, 217, 234, 236  
 塔泽仁波切, 201  
 谭冠三, 155, 158, 201-202  
 天宝, 127, 129, 198, 204-205, 212-213, 241, 269  
 《天葬——西藏的命运》(王力雄), 296  
 田中田, 126, 127  
 统战部(北京), 138, 174n, 197, 204, 258-259, 261  
 图旺(图登旺秋, 平汪弟弟), 109-110, 114, 225, 235n, 236, 244

## W

- 万里, 324  
汪锋, 136-137, 174, 185, 192, 202-204, 222, 236n, 248  
王光美, 225, 234, 283  
王力雄, 296-298  
王其梅, 133-136, 146, 148-155  
文化大革命, 238, 246-248, 255-258, 261-262, 271  
乌兰夫, 197, 259, 274, 278  
吴钰, 235, 236n, 237  
吴忠, 127, 133

## X

- 喜饶嘉措, 136-137, 340  
《西行漫记》(斯诺), 31  
西藏各地区学生四川联合会, 32, 33  
西藏共产党, 31, 42, 111-113, 118-119, 124, 135, 150, 210, 216, 286  
《西藏镜报》, 84, 217, 234  
西藏人民会议, 163, 165-166, 173  
西藏人民统一联盟, 68  
《西藏日报》, 169  
西藏雪域共产主义革命小组, 68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185, 189, 192-193, 195, 206, 341  
习仲勋, 176, 280-281, 283-284, 286  
夏格巴(藏官), 132, 316  
谢富治, 223  
《新观察》(报刊), 233  
夏克刀登, 52, 126, 131, 196, 208  
新华社, 29, 258, 272, 274  
新文化之家(巴塘), 125  
《新康藏之歌》, 11, 13  
星火社, 49, 309  
徐淡庐, 149, 157, 188, 225, 241  
薛剑华, 258, 265, 278, 381  
雪康, 110  
雪山狮子旗, 163-165; 毛的评论, 182-183

## Y

- 牙含章, 158, 170, 350  
延安, 15, 44-46  
杨岗, 225  
杨静仁, 236n, 259, 261, 263-265, 278-284  
杨岭多吉, 274, 282, 285-286, 338  
药王山藏医学院, 193  
叶剑英, 45-46, 79, 129, 286-287  
印度共产党, 75, 78-83, 87, 109-111, 127, 146  
阴法唐, 127, 270, 273-274, 282, 285-286, 379  
《与达赖喇嘛的对话》(王力雄), 297  
袁世凯, 2  
《月球存有液态》(平汪), 287, 294

## Z

- 扎什伦布寺, 85, 140, 170  
占堆, 49, 51, 57, 69, 91  
张治中, 26  
赵范, 177  
赵紫阳, 281, 285-287, 295  
哲蚌寺(拉萨), 67  
中央党校(北京), 185, 191-192  
中央高级干部隔离反省所(秦城一号监狱), 225, 262, 293  
中央政治学院(国民党), 23  
中央31号文件, 324, 351, 363  
中央46号文件, 324, 351, 363  
中国佛教协会(1953年成立于北京), 174  
《中央关于接待达赖班禅的有关指示》(李维汉), 176  
仲阿西, 97-99  
周志柔, 27  
朱德, 96, 124-126, 144, 177, 180  
朱迪巴布, 78, 80  
《自然辩证法新探》, 287, 294, 387  
自贡县人民政协, 254  
紫荆娜, 115-116, 221, 245  
邹韬奋, 44